

前 言

本书是一部研究经济问题的论著，我们没有采取通常的做法，把她叫做“什么什么经济学”而是以“经济是什么”这一设问为书的标题，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主要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

自有人类以来，人就不断从事经济活动，而且经济是人类社会中最主要的一种活动。人类从事经济活动以来，就不断对经济进行认识。一部浩瀚的人类文化史，其中就闪烁着许多经济思想的光辉。自近代经济学科诞生以来，这方面的论著真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也的确蕴涵着无数正确的成分，甚至是真理的萌芽。但是，总的说来，经济对于人的认识来说，还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对象。如果把经济比喻成人的坐骑的话，那么它还是一匹未经驯服的烈马，有时可以载你百里，有时又会把你颠覆马下；如果把经济比喻成一盘棋的话，那么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把它走活，一时似乎可以占位夺子，棋开得胜；转瞬间又可能丢盔卸甲，被杀得遍体鳞伤。一句话，人们还未完全进入经济的“自由王国”。

诚然，经济，尤其是现代经济，的确是个复杂的事物。它是一个多方利益，多个系统，多重层次的综合体。要对经济认识得比较全面、比较透彻绝非易事。但我们认为，只要能够挣脱一些传统的错误观念的束缚，只要不受“本本”的纠缠，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历史出发，通过对大量的

经济现象，进行比较科学的、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然后得出对经济比较正确的认识，是不难做到的。当然，在认识方法上宜“由表及里 由此及彼”地分步进行。而不应满足于对经济简单地作出某种想当然的抽象的判断。

从根本上讲 人们之所以对许多社会问题（包括经济问题）搞不清楚是什么，主要是对人类社会、对人类进化等根本性的东西不清楚。这些根本性的东西，就是主客体关系学所探讨的一些基本原理。我们认为，只要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来认识经济，就不难把握住经济的本质。主客体关系学实际上是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方法，或者说，为开启经济这座迷宫的大门，提供了一把钥匙。

现在我们手中已经拿着这把钥匙 因此 我们不揣冒昧，不妨对自己提出一些较高的要求，即本书的基本目的 力争把经济说个“明白” 尽可能弄清楚经济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把书名确定为“经济是什么”。当然不可能把什么问题都说明白，只是相对于传统经济理论来说要明白一些。而且有些问题今天不可能说明白，今天不能说明白的，等以后条件成熟了再说。

要把经济说明白，就应该对经济的基本性质进行分析。哲学上有个很普通的道理，就是对事物的认识，应该先“定性”后“定量”分两步走 因为“定性不准 定量必谬”。本书打算先走第一步。

要把经济说明白 就应该对经济从现象到本质 有个

比较全面、准确、深刻的论证和阐述，建立起从经济哲学到普通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尽可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做到“雅俗共赏”。

要把经济说明白，本书的逻辑框架确定为：首先对经济和经济学的现状作一概略地描述，然后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对经济是什么作一明确的界定，并运用探本溯源的方法，论述经济形成发展的根本缘由、动力及基本规律，剖析经济的基本结构，最后找出现实经济运行中得失成败的主要原因。

鉴于此，本书的具体任务是：

- 一、提出一种较新的经济观；
- 二、为经济决策提供点谋略；
- 三、为经济学家拓展点思路；
- 四、为经理老板讲点生意经。

由于这是一种全新的探索，又由于我们的能力和水平有限，不足和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第 一 章

经济和经济学说的现状

—— 处于自发状态和滞后状态

通观今日世界 从总体上讲 在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推动下，经济是不断地增长的，而且是朝着全球一体化的方向迅速发展，一般再也看不到像本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那样世界性的破坏严重的大危机了。当然，这种增长和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而且从社会制度的角度看，不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或从经济体制的角度看，不论是偏重自由放任的经济，还是偏重行政管理经济，似乎还没有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理想模式，而且总是程度不同地被这样几大难题困扰着：

(1)怎样做到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即既能使个人和企业获得好的收益，而又不给社会造成不应有的危害，使两者的利益统一起来。

(2)怎样做到国民经济既能高速发展，所谓有“效率”而社会分配又比较“公平”如能够实现充分就业，贫富差距不大。

(3)怎样做到既使企业自主经营，而宏观又不失控？即既使企业充满活力，而整个国民经济又不至于出现自发的无序的状态。

(4)究竟是私有制优越 还是公有制优越 两者在国民经济中，各应占多大的比重？

虽然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但是 以上四大难题，或者说四大矛盾，几乎在每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着。所谓“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由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很大，所以有人把这些难题，比喻成经济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其实，这些问题早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就开始暴露。那时的产权几乎都是私有的，企业按照市场信息独立自主地生产经营，即市场需求什么，就供给什么。由于善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生产效率提高较快，经济效益日益显著，表现出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基于这种现实，产生了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经济学。他们认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只要受一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指难以估摸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规律）的支配，就能既使私人企业主获利，又能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微观和宏观之间，自然而然会协调一致的。

但是 1825 年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爆发了经济危机。随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总是由萧条、复苏、高涨到危机，每隔 8 年 10 年就循环一次。尤其是 1929—1933 年长达 4 年之久的大危机，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波及到了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次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下降了 44%。失业人数达到 5000 万人左右。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促使人们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看法。从微观角度看，或者说从企业的角

度看，私有经济的确讲究生产效率，注重经济效益。但从宏观角度看，或者说从社会的角度看，整个经济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一方面产品容易过剩，社会财富浪费巨大；另一方面广大劳动者收入微薄，失业严重，社会动荡不安。这说明西方古典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从此资产阶级政府开始认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性。较为突出的要数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的“新政”。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于 1936 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批评了古典经济学中自由放任的观点。明确指出国家应从宏观上干预经济。在这种经济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继加强了对经济的计划管理。一方面通过投资、赎买等政策发展国有经济，使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上升，有的高达百分之二、三十，其目的是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部门实行国家垄断；另一方面运用税收、财政、金融等手段，刺激投资和消费，提高有效需求，实行充分就业。同时，限制私人企业垄断，限制高收入，增加社会福利，缓和劳资矛盾。这些措施，对克服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顺利发展持续 20 年之久的“黄金时代”。然而自 70 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逐渐减弱。西方资本主义又陷入了长时间经济停滞、失业严重、通货膨胀的所谓“滞胀”时期。从 80 年代开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变国有经济为私有经济的浪潮，减少国家干预、提倡自由竞争的

主张又重新抬头。

现代西方经济存在着不同的模式。从管理体制上看，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美、英式的偏重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一类是德、日式的偏重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可是这两类模式，都没能使经济长期持续稳健地发展。如美国，债台高筑，如日本，出现“泡沫”。即使令人称道的新加坡，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明显两极分化，出现了所谓‘有’和‘没有’两个民族，使其政府焦虑不安。这就是说，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彻底解决四大难题。所以，继凯恩斯主义之后，又陆续出现了若干种新的经济学派，不断提出新的经济主张。而这些新的经济主张，始终未能跳出“自由竞争”和“政府干预”两种框架。所以，最近由东南亚突发并迅速影响全球经济的金融危机，又促使人们到处在呼唤国家应该实施扭转形势的景气计划，从而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的观点似乎又要唱主角。

我们将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作一比较，不难看出，前者强调微观作用，强调企业自主；后者强调宏观调控，强调国家干预。事实证明，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实行起来，都不免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好比行船，只有划桨，没有掌舵的不行，这样做，难免偏离航向；只有掌舵，没有划桨的也不行，这样做，船只无法前进，所以二者不可偏废。行船的这个道理人们不难理解，然而人们还远没有认识到经济的微观

与宏观之间，也是一种不可偏废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当然，更为主要的是，西方的经济理论，长期远离经济的实质和根本，只在运行形式上是自由竞争、还是政府干预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似乎经济中的全部问题，就是在二者之中如何取其一。这就像认为汽车能否安全高速行驶，与汽车本身的构造如何无关，与道路的质量如何无关，全部问题只决定于是靠左行驶，还是靠右行驶一样，这显然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其结果，不论按照哪种主张办事，都只能是治标而不治本。

从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到今日西方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经济学说，它们有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以私有制存在的“合理性”为前提建构起来的。这一类经济学，人们通称为“西方经济学”。尽管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着许多正确的成分（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是其中的“边际效用论”）。然而历史证明，西方经济学始终开不出一副能够根治资本主义经济痼疾的良方。所以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就不断有人对西方经济学的现状进行抨击。例如出版了《经济理论的危机》（美国的贝尔和克利斯托尔主编）《经济学的贫困》（美国的威尔伯和詹姆森合著）等著作，还发表过更多的类似文章。他们认为西方经济学既不能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又难以准确预测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

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在 1951 年发表的《投入产出经济学》一文中就明确写道：“今天的经济学出

现了这种情况：一方面理论高度集中而没有事实，另一方面事实堆积如山而没有理论。把‘经济理论的空筐’充实以有关的经验内容的任务，日益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了。（摘自《投入产出经济学》一书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第 12—13 页）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情况又起了怎样的变化呢？尽管在自由竞争论和国家干预论的两大根基之上，又衍生出若干这样和那样的新的经济学派，但对经济中出现的重大事件，仍然是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看法。往往彼此观点对立，长期争吵不休。所以世界闻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一针见血地指出：“毋庸置疑，如果把危机理解为不能解决现代的问题，那么现代经济科学就处于危机状态之中。”（多普菲：《未来的经济学》第 3—4 页）1995 年 7 月 21 日法国《回声报》刊载了一篇题为《经济学》的文章也直言不讳地批评说：“经济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今天不合常情的是，曾一度受到尊重的经济学却日益不受重视。这一点在普通的公民身上可以得到证实。令人感到吃惊的是，经济学家们不仅预料不到出乎意料的经济变化，而且对这种经济变化大为吃惊，如危机的持久性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既然国家的命运和繁荣越来越取决于经济的成分，人们不明白专家们为什么不能指出必须作出的正确决定。”

不仅如此，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和数学家还想单纯地依靠数学来攻下经济学这个顽固的堡垒。哲学上有个最普通的道理，即对任何事物的分析和研究，只要定性不准

确，就必然导致定量的荒谬，或者只是玩弄数学的游戏，而毫无实际意义。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我们已看到，数学在西方经济理论实证研究中应用的普遍性、深奥性。从完全用数学公理化方法研究的数理经济学到扩展为含有上千万变量的大型宏观经济模型，仿佛把我们引入了一个同符号、数字以及繁琐运算结构装饰起来的数学迷宫。事实上，西方大量的经济模型预测的记录表明，其作出的预测有时会像天气预报的失误那样使人们感到非常失望，特别是在经济波动的转折时更是这样。我们也看到，即使在进行纯理论分析的数理经济学中，那些抽象而似乎又远离现实的种种假设条件，加之基本上一连串‘虚无飘渺’的严密逻辑推理，总使人有一种无法明状的感觉，一旦把其理论真正用于实际又感到非常难以把握，甚至束手无策，面对纷繁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毫无成功的信心。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目前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还远远难以主宰经济学，经济学问题的难度对于目前数学的解释能力来说仍太高大了，或许经济学的复杂性对于人类的认识能力来说过分庞大了，每个人似乎永远只能触及到它的一小块表皮，使得人们通常对物理学的期望在它那里将永远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

（选摘陈璋等著《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证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58—59 页）无怪乎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艾克纳主编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一书，对当今的经济学家们，进行了这样一番斥责：

“由于经济学的药方不仅没能解除疾病，反而似乎加剧了病情，政治家和公众都已变得不耐烦了。他们开始避免与经济学家交往，就像任何关心自身崇高声誉的人讨厌与占星学家、炼丹术士及诸如其他江湖骗子打交道一样。”

综上所述 尽管西方经济学经过了一而再地“革命”，但至今仍未成为一门行之有效的科学学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19 世纪中叶以来，从西方到东方，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批判资本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革命浪潮。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人们通常认为 马克思主义由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我们的看法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划时代巨著——《共产党宣言》为主要代表的革命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其中所阐明的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革命思想和观点是正确的，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 哪里就鸣不平 这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绝对的”真理。因而在本世纪 继“十月革命”之后，一系列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是常青的，永恒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 原苏联、东欧以及中国

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夺取政权之后，首先实行了生产资料由私有转化为公有的变革，然后逐步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人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经过长时间的理论上的探讨，逐渐编纂了一类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教科书”（请注意 对这类教科书 本书统称为“传统政治经济学”）。传统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部分的基本内容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进行计划管理，并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从 30 年代开始，苏联就通过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来领导经济，形成了一种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效法的“计划经济”的运行模式。计划经济讲求分配公平，注重社会效益，在这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使资本主义相形见绌。但是计划经济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最主要的是 产业结构畸形 生产效率不高 经济效益较差 消费品长期全面短缺，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改善不快，这些方面，又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从 50 年代开始 首先是南斯拉夫 后来是匈牙利、波兰逐渐背离苏联的经济模式，迈开了改革的步伐。到了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改革的浪潮席卷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总的趋势是：逐步克服国家对经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做法。同时引进市场调节机制，发挥企业的自主作用。在坚持国有经济为主的前提下，适当发展个体、私

有、外资等其他成分的经济。

这场改革的掀起，不是由于经济理论上有何重大的变革和突破，主要是为了摆脱长期的经济困境不得已而为之。然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正因为如此，苏联和东欧的改革走投无路，只好改弦易辙，全面恢复了资本主义。现在中国仍在向前迈进，成就辉煌，举世瞩目，并在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努力。

然而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原属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四大矛盾也日益缠身。例如国有企业一般注重社会效益，但经济效益却不佳；其他经济成分的经济效益较好，但有损社会效益的坑蒙拐骗、偷税漏税等现象比较严重。又如，私有企业对繁荣经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收入偏高，与广大工薪阶层相比，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分配不公日渐突出。再如宏观上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如天天喊“政企分开”可是政府和企业就是难解难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管理体制，始终缺乏明确的目标。重复建设、产品积压、下岗人数逐年增加，这些不良趋势如何遏制和避免，也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还有，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据统计，由改革初期的约 80%，下降到今天已不足 40%。按照这个趋势，预计到 21 世纪初，可能降至 25% 以下。这就退到了资本主义可以包容的限度之内（以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为例，据统计，70

年代，国有企业投资占社会投资总额的比重，法国是 33.5% 英国是 30% 意大利是 28% 西德是 22.7% 日本是 24.19 美国是 18.49)。那么这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国有与私有，到底应该各占多大比例才算合适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或者说 国有和私有 究竟是相互对立 还是可以彼此兼容？在什么条件下对立，在什么条件下兼容？.....这些似乎都是未知数。总之，改革中的中国，同样面临着四个“两难抉择”。.....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理论上讲 既然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首先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既然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又必须参照西方经济学，吸取其中有关市场运行的合理的理论，然后将这两部分进行综合，构建成一部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可是 时至今日 人们能看到的，一部分人还在那里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毫无创见地进行“诠释”再“诠释”。德国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施莫勒曾经说过：“政治经济学的的一个崭新时代是从历史和统计材料的研究中出现，而绝不是从已经经过一百次蒸馏的旧教条中再行蒸馏而产生的”(转引自鲁友章等主编：《经济学说史》下册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178 页)。搞“诠释经济学”的人，不正是对被无数次蒸馏过的旧教条，还在继续进行蒸馏吗？另一部分人则又无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显然，这两

种态度都是不正确的。1996年8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谷书堂写的《探求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与建构》一文，文章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现状作了比较客观的描述，作者认为“改革开放的深入迅速拉大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差距，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正在为基础理论经济学事实上的缺位而困扰。从目前情况看，这种现象突出表现在曾经一度占据基础位置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与在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应用经济学理论的内在联系正在不断弱化。只要我们翻开货币银行学、国际贸易、市场营销管理等应用类教科书，就会发现越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结合紧密的学科，离现行的反映市场经济不充分的政治经济学越远。而适应市场经济实践需要的应用经济学理论则纷纷改换门庭，使自己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挂钩；由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局限不能为应用经济学理论提供支持的政治经济学，则由于它的分支学科纷纷与其脱钩而使自己的基础地位不能不处于虚置状态。”

总的说来 当今世界上无论哪种类型的经济 基本上还是作为一种“自发”的力量在运转着。马克思在1868年致路·库格曼的信中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对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 第581页）一百多年过去了，看来整个经济基本上仍然是处于“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对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